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設計

一、研究動機

筆者從大學時代便修讀了民族學系，在唸書的過程當中，選修的主題多是中國穆斯林¹及伊斯蘭教文化的相關課程，報考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時，對「中國雜散居少數民族」的研究，有著極大的興趣，引發筆者想撰寫該篇論文的動機。在過去的中國少數民族研究方面，多針對「少數民族聚居區」的範疇作為研究的主題與面向，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與政策執行等不同因素影響之下，少數民族不只聚居於傳統的民族地區，也逐漸地向外流動，和周遭的漢族或其他的少數民族相處與互動，也因此出現了「中國雜散居少數民族」研究的議題。

在一九九〇年代中國人口普查的資料中，提到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共有3,500多萬人，佔了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的三分之一。²「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中，最具有代表性質的莫過於「回族」了。回族隨著中國歷史的演變過程中，由於其善於經商和元朝曾位居色目人的角色，其分布範圍多以「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居住，大分散指的是在中國各省份中，都可找到回族的分布，小集中則是以伊斯蘭教的特色—寺坊制度，圍繞清真寺而居的居住型態，多於京城首府附近或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中，和周遭其他民族雜散居的情形也就更為顯著，在民族學與民族誌的研究上，比起其他的少數民族有更多可以深入探討的面向。在台灣學者張中復的〈回族現象觀察的「點」與「面」—從三本回族調查資料的研究取向談起〉一文中，談到回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中分布最廣，僅次於漢族的民族，若從民族學方法中田野調查研究的角度看來，如何透過單一研究選「點」的積累，以達到對回族整體「面」的建構與認知，應是中國民族學中相當具有特色的一個議題。³

因此，本文將針對「散雜居少數民族」中的「都市回族」作為研究的方向，選定的主題為「北京牛街回族社區」，其與台灣新興出現的都市原住民社區不同，「北京牛街回族社區」在北京已有近千年的歷史，成為中國對外宣傳宗教政策的一個重鎮與窗口所在，每年中國穆斯林到麥加朝覲時，除部分地區穆斯林之外，大多需到北京牛街清真寺受訓與講習，及透過「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一同辦理朝覲事宜。在「牛街回族」是都市世居散雜居回族，再加上「牛街清真寺」為中國

¹穆斯林：伊斯蘭教信仰者的通稱。在中國有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烏茲別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爾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 10 個少數民族信奉伊斯蘭教，統稱「中國穆斯林」。本文中提到之「穆斯林」皆指「中國穆斯林」。參考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年，頁403。

²中國民族事務委員會信息中心，查詢日期：2005/5/23，

http://www.seac.gov.cn/cm/cm_bulletincontent.do?id=cm00846195a88f6d&xslt=template_center2&action=20。

³張中復，〈回族現象觀察的「點」與「面」—從三本回族調查資料的研究取向談起〉，收入馬平主編，《人類學視野中的回族社會》，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5。

伊斯蘭教的宗教中心，因此「北京牛街回族社區」的重要性跟其他中國都市回族社區有著不同的現代都市意義。

在北京市，漢族與中國的 55 個少數民族都在此居住、工作、求學，成為全中國民族成分最完整的城市。在二〇〇〇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北京市有回民人口 235,837 人；北京城區少數民族人口密度最大的是宣武區，其中回族人口有 27,668 人，主要集中在牛街社區內。⁴牛街居民有 54,331 人，是北京回族聚居地之一，在牛街的回族有 12,561 人，占地區總人口的 23.1%。⁵由這些資料，可以發現回族在北京市，有著人口上的優勢，北京市政府在考量市政規劃時，應當也要考量到民族政策的相關措施與方案，因此本文想探討的主題是，政府在執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政策時（例如：中共政權的宗教政策、教育政策、經濟政策、都市更新計畫等），對於「牛街回族社區」等都市世居回族社區所造成的影響，筆者透過社區的演變、回族宗教的信仰程度、經濟發展的創新狀況、民族邊界的改變過程等方面，來探討牛街回族的適應情形，以提供筆者對於學術界研究「都市世居散雜居回族」議題上的一點小小貢獻，找到「都市世居散雜居回族研究」在「中國回族研究」中的意義與定位。

二、內容架構

本文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節先介紹論文的研究動機與預期目標、內容架構、研究方法、研究限制；第二節針對相關文獻做整理，並對研究概況作回顧和介紹；第三節則對「當代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作定義，並介紹中國學者對於「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的分類，最後介紹「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細分之下的「都市少數民族」此主題的研究特色與意義，並與第四節的「當代中國都市回族社區研究」議題相呼應，此節針對當代中國都市回族社區的研究重點與引發都市回族社區變遷的因素和影響，作一詳細的說明。

第二章承接上面的議題，將直接聚焦於「北京牛街回族社區」來做討論，第一節先將牛街回族社區居民的來源與形成過程作介紹，從元朝到中共政權下的「牛街街道辦事處」，將其脈絡背景作一歷史性的描述；第二節介紹牛街清真寺的創建與建築樣貌，介紹牛街清真寺自明朝以來的重要宗教地位，亦為中國伊斯蘭教的主要宗教中心之一；第三節則討論清真寺內部的兩大功能，亦即「掌教制度」與「寺坊制度」在歷代中國政權影響下的轉變過程，來解釋今日都市回族宗教信仰薄弱與宗教功修實踐欠佳的情形；第四節探討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五年期間，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政府針對牛街回族社區的「危改計畫」，作一背景式的介紹，將政府推動「危改計畫」的原因、「危改計畫」的內容與對回族社區居民的影響，作詳細的交代。

⁴中國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經濟發展司編，《2000 年人口普查中國民族人口資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 8 月，頁 5、640。

⁵北京市牛街地區現狀調查組，〈北京市牛街地區現狀調研報告〉，收入中國都市人類學會秘書處編，《城市中的少數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年，頁 3。

第三章對回族傳統的行業結構作介紹，並分析各行業之特色與所代表之社會地位，加上位處北京宣武區的都市化影響下，回族逐漸改變原有的職業結構和消費模式，藉此來探討都市回族的價值觀轉變與文化適應；再針對於牛街拆遷後，傳統的清真小吃店舖與民族用品店式微下，「牛街民族特色街區」的興起，例如：牛街清真牛羊肉市場與牛街清真超市造成的社會影響。

第四章針對都市回族在經濟發展後，教育水平提升與經濟能力提高後，促使了都市回族與漢族通婚的狀況增多，此時族教邊界的轉變，便成為都市回族的認同危機，在第一節中將提到族際通婚狀況的適應過程；第二節則對「危改計畫」後，回漢居民的民族關係加以討論，在都市回族社區中如何形成多民族的相處模式與實際狀況；第三節則是針對每年赴麥加朝覲的穆斯林團體，到北京牛街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受訓時期，如何和回族社區居民產生經濟與生活上的互動過程。

第五章主要是以民族政策的制定與居民權益，以及宗教學習班和節慶儀式與回族認同這二個議題來看，筆者對於該回族社區轉型的看法，討論牛街回族的宗教傳承與牛街回族社區從封閉到開放的轉變過程，作一總結。

第六章，本篇論文的最後一章，是回顧以上五章的總結，試圖從本論文所觀察到的現象與發展，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希冀透過研究北京牛街回族的個案，作為都市回族研究中，一個可以持續觀察的點。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論文中所整理的相關文獻，首先是中國學者關於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城市民族工作、中國都市回族議題的相關研究作分析，來探討牛街回族社區的定位；其次是針對北京牛街回民的形成、牛街清真寺的宗教特色，來介紹牛街回族社區的形成與轉變過程；最後針對北京市宣武區政府推行都市更新計畫（危改計畫）的議題，收集相關研究著作、期刊、報紙、網頁資料來加以佐證。

（二）田野調查法

筆者有幸參加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張中復老師與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副教務長高占福老師領隊的「中國大陸西北穆斯林社會田野調查隊」，在二〇〇四年六月卅日到七月二十二日期間，和政大民族所的學長姐們，前往中國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蘭州市作「社會經濟」的研究調查。在出田野前，已受過相關課程的訓練，閱讀中國穆斯林的研究文獻，進行課堂討論，對於中國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與生活方式等議題加以了解，也事先擬定了問題意識，針對想訪談的對象擬定了相關的提問，跟當地的偕同研究者商討過後，適時地修改訪談的面向，與報導人做深度的訪談調查，每天也會將田野過程作成日誌，已備日後查詢。回到台灣後，經過修改與潤飾，加上自己的分析與探討，和學長姐們合寫出《黃土高原上的伊斯蘭》一書，作為政大研究生對於中國西北穆斯林地區的田野調查報告，更於二

○○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政治大學舉辦了田野成果發表會。

由於參與過這次的田野調查，筆者在田野調查的擬定問題意識、訪談技巧、報告撰寫等方面獲益良多，這次的經驗更幫助筆者在研究牛街回族社區時，有著可以借鏡之處，筆者在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離開「中國大陸西北穆斯林社會田野調查隊」的成員後，便在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這段期間，親自到牛街作初步的田野觀察，拍攝相關的田野照片，蒐集相關的書籍與文獻資料。回到台灣後，撰寫研究大綱，再度針對自己的研究計畫，主要以經濟生活和族群關係兩大面向擬定問題意識，為田野計畫作事前的準備。

筆者有幸參與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研究生田野調查的獎助計畫，在資金無虞的狀況下，在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七月十九日期間，再度前往牛街回族社區作第二次詳盡的田野工作，透過田野指導老師〈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副教務長高占福老師與前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政法司的張崇根老師〉和協同研究人員〈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回族學生韓峰先生與牛街回族居民李娜小姐〉的協助，筆者順利找到符合問題意識的報導人，針對事先擬定的計畫加以訪談。在訪談過程中，也配合當地的人文風情以及生活情形，適度修正田野方向。在田野調查過程期間，每晚撰寫當天的田野調查日誌，並取得報導人之同意，在訪談時，輔以錄音、拍照等多媒體影音紀錄，以作為筆者日後整理訪談資料時之佐證。在牛街回族社區訪談的期間，筆者也配合回族的飲食習慣，全程食用清真飲食，這點讓當地的回族居民感到十分溫馨，此點也幫助了筆者順利走進田野，讓牛街回族卸下不同民族身分的心防，做到尊重報導人的田野倫理要求。

回到台灣後，筆者和其他學長姐們參與了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於政治大學舉行的「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補助田野調查發表會」，發表筆者在牛街社區所觀察到的現象。在撰寫論文的時間，隨時與田野指導老師、協同研究人員與報導人保持聯絡，詢問相關的問題，以確保能夠在撰寫期間，適當地反映當地即時的狀況與持續性的發展；也會整理訪談所錄的錄音稿，以作為撰寫論文之用。

經過了兩次的田野調查，希望能夠結合書面資料與筆者實際觀察狀況，改善筆者過於主觀缺乏事實根據的假設，透過參與調查與深度訪談的兩種方式，呈現出北京牛街回族目前的生活狀況。

本文指稱的「牛街回族社區」，即為今日中國北京市宣武區行政區劃（附圖二）下的「牛街街道辦事處」之行政範圍（附圖三），其社區位於北京市的相關位置（附圖一）。筆者訪談的對象以長年聚居在北京牛街回族社區中的回族居民、具代表性的回族商行之工作人員、牛街清真寺的阿訇與寺內教務人員，以及對回族研究與都市回族研究學者等。

四、研究限制

由於本文的田野地點敏感性高，北京市為當今中國的首都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政治地位的敏感度高，以及回族是中國的重要少數民族，民族問題也是中共

政策的重點，再加上牛街回族是都市中的少數民族，基於牛街回族是首都的少數民族身分，使得筆者受限於中國大陸政府的國情因素，無法進入政府部門借閱或研讀相關政府統計數據或相關政策文件，只能以中國當地報紙或期刊等管道取得資料。由於缺乏相關的敏感性統計資料，無法深入探討未回遷的回族狀況，以及回遷人口的比例數據，作為筆者對於牛街回族拆遷戶口的追蹤訪談依據，此為研究上的限制，在此特為說明。

由於本文的研究主題是北京牛街回族社區的變遷與適應，探討的時間包括了自元朝到一九九七年「危改」計畫推行迄今所發生的過程，涉及到的年代時間久遠與探討的主題較多，筆者擔心對於各議題的文獻收集不盡完整，以及在田野調查過程中，礙於時間與經費預算，針對牛街危改計畫的影響層面，無法一一找到牛街所有回族居民進行訪談，無法做到全面性的總體調查，以及具有持續性且有研究成效的長期田野調查，僅能選取數個具代表性的個案加以研究，期望能做到初步研究牛街危改計畫的描述與分析。

綜合以上不確定的因素及個人能力的問題，將是這份研究計劃的無形限制。

五、預期成效

在現今台灣學術界而言，對於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大多針對蒙古族、藏族、滿族、苗族等，針對回族的研究領域較少。然而在回族研究中，以都市人類學或社區研究的角度切入之研究文獻，目前本論文是台灣學界的第一本，筆者認為此論文具有台灣學界對中國都市回族社區的開創性研究之價值，希冀可作為台灣學術界在理解中共政策對都市回族社區的變遷與適應之研究代表。

第二節 相關文獻及研究概況回顧

目前學術界對於北京牛街回族社區與牛街回族的研究不多，雖然有許多對於中國各地的回族研究著作出現，筆者認為牛街回族屬於中國回族研究範圍之中，應該先針對「中國伊斯蘭教」對於回族的影響程度加以了解後，再從民族居住型態分類的研究中，以「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研究」與「中國都市回族研究」這兩個議題切入，充分理解牛街回族在中國學界的研究定位，最後再直接切入到「北京牛街回族研究」的社區研究與宗教文化研究議題，會是對於「牛街回族」與「牛街回族社區」解析較為全面的研究方式。

一、中國伊斯蘭研究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發展，穆斯林的人數日益增加，從唐朝的「蕃客」到今日的「中國穆斯林」，隨著中國歷代政權的變遷，以及和中國其他民族的通婚與相處之下，原先帶有阿拉伯風格的民族文化，逐漸與漢文化相融，造就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文化，也形成了中國學者對於此主題的研究出現。

李興華等學者所編著《中國伊斯蘭教史》一書，對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歷程有著詳盡且客觀的分析與描述，從伊斯蘭教傳入中國開始，依歷史脈落分成五大篇，分別為唐宋時期、成吉思汗西征到明朝中葉時期、明朝中葉到清末時期、民國時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等五個歷史時期。書中敘述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入時間、傳播方式、及伊斯蘭教在中國如何適應與發展，除了介紹伊斯蘭教的傳入與歷程，也對每個時期的穆斯林在社會地位、政治角色、藝術發展、對中國的貢獻、經濟狀況、以及宗教生活等方面做全面性的分析，使讀者可以充分了解中國伊斯蘭教對於穆斯林的深刻影響。此書幫助筆者理解中國伊斯蘭教的傳播與發展過程，並可從中看出歷代政權在政策、經濟、宗教等方面，對於北京穆斯林的影響，造成他們願意在中國安家落戶，世代繁衍，結合了中國文化與伊斯蘭文化，形成一種嶄新的中國伊斯蘭文化體系。

楊啓辰、楊華所著《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發展與現狀》對於中國十個穆斯林民族有清楚的解釋，可分為兩個系統，一是以回族、撒拉族、保安族、東鄉族為代表的伊斯蘭信仰體系，他們是由阿拉伯、波斯與其他西域地區遷徙而來的穆斯林和中國當地的民族通婚融合而形成的新民族，伊斯蘭教對於他們而言，具有精神性與原創性的作用；二是以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茲族、塔吉克族、烏茲別克族、塔塔爾族等的伊斯蘭信仰體系，他們是在形成了本民族獨特的民族文

化後，才信仰伊斯蘭教，因此宗教對他們而言有著推動與干預的作用。⁶伊斯蘭教對於此兩種類型的民族有著不同的影響，前者與民族形成有關，經過家庭環境的薰陶而深植於民族文化之中，後者則是與政治因素有關，教義已滲透到穆斯林的思想、生活習慣之中，深刻影響原本的民族文化。在十個中國穆斯林民族中，受到漢文化影響最深的便是回族，回族結合了伊斯蘭文化與漢文化，從語言上來看，他們使用漢語與其他民族溝通，但在民族內部彼此互動時，衍生出伊斯蘭教的經堂用語，即爲此例，透過經堂用語的使用，區分出了回族與漢族間的差異性。本書談到許多中國伊斯蘭教對於穆斯林在哲學、倫理道德、文化思想、教育思想、經濟思想及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等方面，作各章的分析，此爲了解中國伊斯蘭教與穆斯林關係的深入研究著作。

勉維霖的《中國回族伊斯蘭宗教制度概論》一書，則以中國回族在實踐伊斯蘭教方面做出深刻的分析與描述，談論到伊斯蘭教的信仰與功修、宗教慶典，穆斯林的婚姻、喪葬、飲食制度，清真寺的組織與教育形式等主題。在「傳統宗教特定節日」方面，宗教節慶往往與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結合，充分顯示該民族生活中的歷史演變、風土人情、信仰心理、倫理道德與民族文化等因素，這些宗教節慶會在隨著歲月而世代流傳，也會不斷地有所創新，振奮和輔慰人們的心靈，⁷凝聚了世世代代回族的宗教信仰；「婚姻與家庭制度」在伊斯蘭教制度占有核心的地位，家庭教育是每個穆斯林第一個接觸到伊斯蘭文化的場所，對於一個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與回族認同是極爲重要的部分；「生活禮儀」的實踐，正可以看出穆斯林對於宗教的虔誠程度。此書透過每個專章的介紹，深入地探討伊斯蘭文化與宗教信仰對於中國回族的影響性，說明了回族與漢族之間的民族差異。

二、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研究

中國境內有 56 個民族，由於歷史的原因，各民族形成了大雜居、小聚居、互相交錯居住的狀況。根據中國少數民族分佈的這一情況，大陸學者把中國的 55 個少數民族分爲「聚居少數民族」和「散雜居少數民族」，其中「散雜居少數民族」的定義將於本章第三節有詳細的介紹，中國學者在針對散雜居少數民族研究的動機上，大多以政治的角度進行相關的研究，由於少數民族散雜居在中國各地，各民族彼此交流與相處的機會增多，若無相關研究加以調查其狀況，容易使得各地政府機關人員在行政執法上，出現盲點與偏差，因而衍生出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研究的課題。

由「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政法司散雜居處組織」的國家研究單位執筆寫

⁶楊啓辰、楊華主編，《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發展和現狀》，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65~66。

⁷勉維霖，《中國回族伊斯蘭宗教制度概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53。

出的一套《中國散雜居民族工作叢書》，就是結合各民族的文化特色、民族特性來加以撰寫，提供政府機構執行散雜居民族工作的依據。楊侯第主編的《散雜居民族工作概論》是對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工作的總體概述，全書有三個主題，一是對民族散居化過程的理論研究；二是對散雜居少數民族的形成、發展、結構與特點的研究分析；三是對散雜居少數民族工作的內容與形式，以及推行的成果與經驗之總結研究。⁸從此書的論述可以窺見中共政權對於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研究的重視，及對散雜居少數民族工作相關法規的制定過程，而這種從政府角度出發所撰寫的研究書籍，雖然具有官方的統戰色彩，充滿許多宣傳的意味，有著極為理想性的思考模式，試圖以大架構的民族工作套用在各民族身上，容易忽略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是極為可惜的地方，但也不啻為筆者可用來理解中共政權民族政策的途徑，透過閱讀可以看出中共政權的民族政策走向，在於有限度地讓各民族有宗教、經濟、教育的自由，但絕不可挑戰中共政權的威權，成為多民族和諧共處的新中國型態；第二本由楊侯第主編的《散雜居少數民族統計與分析》一書，則從一九九〇年中國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針對散雜居少數民族人口的資料來進行研究，其意義在於闡述中國少數民族人口分布的特徵，也就是說明民族自治地區與非民族自治地區人口變動及其分布情況，從中看出散雜居少數民族人口的流動與分布，並作出全面的研究與分析，進而表達中國目前的民族散雜居化的情形與趨勢，⁹由於中國散雜居的情形日益增加，透過數據的展現，更可以從中理解各民族流動的狀況，並加以分析探討今日中國散雜居民族的現狀。《中國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論與實踐》是楊侯第主編的第三本系列書籍，此書將探討的對象縮小到位於都市的散雜居少數民族，暢談中共政權推行的城市民族工作，其定義與重要性，亦討論到隨著中國都市化與經濟市場的蓬勃發展，都市中少數民族人口的流動日益頻繁，都市中的民族成員日益增加，在新的都市環境中，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與衝突要如何化解，中國學者對此現象感到憂心，研擬出一套城市民族工作法規的執行來加以解決，希望透過政策法律的約束、各民族幹部的培訓、推展民族文化活動，促使各民族進行交流，了解不同的文化內涵，降低民族間的誤解與衝突，促使都市的良好民族關係，作為帶動中國各鄉鎮地區民族關係的動力，此為中共政權推行城市民族工作的主要因素。

中國散雜居民族研究也可以縮小範圍，從中國各地的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個案來加以了解，由於都市是中國各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重鎮，具有代表性與輻射性，做好了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的研究與工作後，做到成為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地區的輻射與橋樑作用。

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國都市人類學會」成立，促使了中國學者對於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的研究，日益蓬勃。該會在一九九四年編著《都市化與民族現代化》

⁸楊侯第主編，《散雜居民族工作概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243。

⁹楊侯第主編，《散雜居少數民族統計與分析》，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頁3。

一書，該書收集了「中國都市人類學會第一屆全國討論會」中學者的發表論文，內容側重於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的婚姻、家庭、親屬關係、宗教信仰的議題，也有對於城鄉關係、農村來都市發展的流動人口、民族社區、都市價值觀與都市居民的行為關係、多文化間的相互影響等主題，此書為來自中國學者對於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研究所提出精闢且多元的研究成果。

由「中國都市人類學會秘書處」編著的《城市中的少數民族》，收錄了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研究的相關文章，其中談論到北京牛街的世居都市回族，北京甘家口「新疆村」、北京魏公村旁「新疆街」的都市少數民族聚居區，以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進入西藏、西安、徐州、無錫、蘇州、南通等都市所引發的各種面向，都有不同專業研究的學者，在本書中發表了他們對於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的研究成果，透過閱讀此書所呈現的各地民族志資料，筆者可了解散雜居少數民族在中國各都市的生活與適應情形，也可看出中共政權的城市民族工作在各地落實的狀況。

三、中國都市回族社區研究

回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中都市化程度最高的民族，近年來，在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及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問題的議題上，都市回族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一部份。一般而言，回族在都市中形成以清真寺為中心的寺坊制度，為具有宗教文化特色的社區，與漢族社區有著迥然不同的風貌與特質。關於都市回族的研究是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首先關注的是都市回族的經濟研究，如張崇根刊登在《民族研究》的〈都市中的少數民族及都市對少數民族發展繁榮的作用〉，其中談到都市回族的分布問題，與都市發展對於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彭年在《回族研究》的〈北京回族的經濟生活變遷〉也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北京回族的經濟發展情形，由於中國學者的投入，至今中國都市回族的研究領域與範疇也越來越廣，不只是漢族學者，連回族的研究者也逐漸重視自己民族的研究，使得都市回族議題的研究者，有了他觀（*Outsider's View*）與自觀（*Insider's View*）的研究面向，充實了都市回族研究的團隊人數。

由於中國都市人類學會的成立，也促使了中國學者投入都市回族的研究工作，例如《都市化與民族現代化》一書中，柏貴喜的〈都市回族社區及對回漢民族關係的影響〉，此文從都市回族的宗教功能與社會定位談起，再深入探討都市回族在民族關係上所面臨到的問題，此為山東淄博回族的個案分析，也有李彬從喪葬議題角度切入的〈金嶺鎮回族的喪葬習俗及其社會功能〉。此外在中國學界對於都市回族議題的期刊中，有馬宗寶、金英花的〈銀川市區回和民族居住格局變遷及其對民族間社會交往的影響〉一文，則對民族散雜居的居住型態作深入的分析，馬壽榮的〈都市回族社區的文化變遷-以昆明市順城街回族社區為例〉、虎

有澤的〈文化適應與民族繁榮：都市中的民族關係〉、藍炯熹的〈城市進程中的福建回族社區—以晉江市陳埭鎮回族七村為例〉等以中國各都市回族社區之研究論文，不勝枚舉，筆者認為這些針對都市回族的研究成果，皆可作為北京牛街回族社區之對照，以了解當代中國都市回族所展現的不同樣貌。

中國學者楊文炯的《傳統與現代性的殊相-人類學視閥下的西北少數民族歷史與文化》中，提出了「Jammāt」的觀點，他說明「Jammāt」（哲瑪爾提）是一種獨特的族群社區，是回族穆斯林在城市社會中的“時空坐落”，它是距離清真寺而居住的地緣結構特點，也是族群意識的展現與族群範疇的邊界，¹⁰他將回族的「寺坊制度」與西方學界「社區」的意涵相結合，針對中國甘肅蘭州市的許多都市回族社區進行了詳細的調查與分析，該書介紹了蘭州市回族在都市生活中，所面臨到宗教、教育、經濟等方面的各種變遷，並探討導致回民生活型態變遷的各種因素，其論點令人折服，然而綜觀當代中國都市回族的現狀，不難發現楊文炯的論點，正好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當代中國都市回族普遍面臨到的狀況與挑戰。在蘭州市同樣也有城市改建與拆遷的情形，馬路拓寬、平房成為高樓、商業街區的出現、郊區的住宅大樓出現，使得原來居住在城中心的回族居民，逐步往郊區移動定居，勢必引發都市社區的變遷，以及居民失落的心態，政府的補償政策，是否能夠滿足居民的需求，也一再地考驗中共政權的應變能力，蘭州市的案例也可作為牛街社區的對照，透過中國學者對都市回族的各點研究，將可拼湊出當代中國都市回族的全貌觀。

台灣學者張中復撰寫的〈都市回族問題研究定位的再思考：從“社區”與“現代化”的互動觀點談起〉一文中，提到以往中國學界對於都市回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歷史現象的沿革變遷，自一九九〇年代開始，都市回族研究偏向以實證為主要的研究方向，採用了兩個研究取向，其一是人文社會學科中以社區（community）概念為主的理論與方法，此與都市回族以聚居形成的寺坊制度觀點相切合，其二是在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影響，都市回族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引發了回族意識凝聚與消散的狀況，其呈現出的各種意涵，對於觀察當代中國回族的相關現象，有著極大的參考價值。¹¹另外，在〈「華夷兼蓄」下的邊緣游移：論當代中國回族民族屬性中的「少數民族化」問題〉與〈回族現象觀察的「點」與「面」—從三本回族調查資料的研究取向談起〉一文中，皆談到了「邊緣性回族」的說法，認為回族的伊斯蘭教信仰形式轉變，加上與其他民族互動交融之後，回族內部出現了另一種民族型態，像是論族不論教的陳埭回族，以及論教不論族的「藏回」和「傣回」，即為此例。〈回族現象觀察的「點」與「面」〉一文，寫到近年來中國大陸學界採取社區式的田野調查，有三本代表著作，分別

¹⁰楊文炯，《傳統與現代性的殊相—人類學視閥下的西北少數民族歷史與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183。

¹¹張中復，〈都市回族問題研究定位的再思考：從“社區”與“現代化”的互動觀點談起〉，收入《第十四屆全國回族學研討會論文集編》，頁618。

是宋志斌與張同基主編的《一個回族村的當代變遷》、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的《中國少數民族現狀與發展調查研究叢書：回族卷：同心縣》、姚繼德與蕭芒主編的《雲南民族村寨調查：回族—通海納古鎮》。¹²上述三本書是針對回族社區所做的一系列民族志，根據各地區的回族民族志資料與回族社區研究（「點」狀研究），輔以邊緣性回族¹³現象與社會文化的多元性研究（「線」狀研究），可構築出當代中國回族的「面」向研究。

美國學者瑪麗絲(Maris Boyd Gillette)有專著《在麥加與北京之間》(*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 Modernization and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Chinese Muslims.*)，作者花了長達十八個月的田野調查時間，研究西安市蓮湖回族社區，寫出這本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的學位論文，該書從現代化與消費的角度，結合經濟人類學、社會學與消費主義文化理論對城市回族社區進行研究。本書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多以實地訪談的田野調查法為主，其選擇訪談的對象則是透過選點的方式，針對不同的主題，選擇各訪談對象，例如：約 200 位的西安回族居民，及民委宗教局的回族與漢族幹部、阿訇以及回族學者，¹⁴是本對於都市回族研究中不可多得的民族志材料。瑪麗絲運用「經濟人類學」和「消費社會學」等相關理論，在國家、地方和全球化的共同範圍中，透過居住在現代化的高樓，有較好的生活品質，日常選購西方產品的消費模式，接受阿拉伯語教育，認為自己能和國外穆斯林地區接軌等方式與國際同步發展，作者解讀都市回族對於自身現代化追求的表達與自我族群的認同，她認為回族作為都市中的亞群體，其追求現代化的過程有幾種困境，例如：傳統與現代化的抉擇、現代的中國化和阿拉伯化，甚至是西化之間的選擇，這也反映出全球化，都市回族所面臨到的困惑與挑戰。¹⁵同時，利用中國西安回族穆斯林的案例來試圖與西方學者的理論做碰撞跟驗證，但或許是受限於外國學者的學習背景因素，在撰寫的過程中，所使用的理論和當代中國民族識別政策的理解，似乎仍有些格格不入之處，例如使用Race來稱呼民族。

四、北京牛街回族研究

牛街位於北京市區的西南角，自明朝以來就是回族的聚居區，經過時代的變遷，逐漸成為中國都市回族研究的代表社區，歷史上許多回族菁英份子皆來自於牛街回族聚居區中，牛街回族也曾經參與過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對於團結各地回族的民族意識，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其重要性與其他都市回族地區相較，不言而喻。但可惜的是，針對牛街回族聚居區全面性探討的研究成果不多，大多

¹²張中復，〈回族現象觀察的「點」與「面」—從三本回族調查資料的研究取向談起〉，頁 15~32。

¹³關於「邊緣性回族」研究的相關論述，請參見張中復，〈「華夷兼蓄下的邊緣游移」論當代中國回族民族屬性中的「少數民族化」問題〉一文，收入《慶祝陳奇祿教授八秩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1年，頁 12~14。

¹⁴Maris Boyd Gillette, *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 Modernization and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Chinese Musli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9~21.

¹⁵Maris Boyd Gillette, *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 pp65~67.

以珍貴的文史資料，或是以伊斯蘭教與清真寺文化、經濟、民族聚居型態與都市計畫角度切入，所撰寫的期刊論文，有馬耀的〈牛街禮拜寺創建 1000 週年〉、李興華的〈北京伊斯蘭教研究〉、周尙意的〈現代大都市少數民族聚居區如何保持繁榮-從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區空間特點引出的布局思考〉、周傳斌與馬雪峰的〈都市回族社會結構的範式問題探討-以北京回族社區的結構變遷為例〉、楊青的〈從居住環境的變化看民族凝聚力〉等論述，可從這些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中，用不同的研究視角來了解牛街回族與聚居區的發展狀況。

「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與「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著的《北京牛街志書—《岡志》》¹⁶一書，是從清雍正初期撰寫的《岡志》抄寫謄錄而來，¹⁷此書的重要價值在於它是第一本紀錄牛街回族聚居區形成與發展狀況的書籍，將牛街回族聚居區在明清時期的狀況加以紀錄，是本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與「北京市宣武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著，劉東聲、劉盛林撰寫的《北京牛街》一書，對於牛街回族社區的牛街發展沿革、經濟、政治、宗教、教育、醫藥、民俗等議題，有著極為詳細的描述。此書的資料，除牛街的歷史沿革外，其他篇章討論的時間年限，均從辛亥革命時期到一九四九年為主，中共建政初期的情況也略有所及，是本內容詳盡的民族史。

中國學者佟洵多年來從事中國近代史、清朝宮廷史、北京地方始和宗教史的教學與研究，也對北京的佛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進行調查與撰述，提供大家了解北京地區的宗教文化現象，其中的《伊斯蘭教與北京清真寺文化》一書，解讀相關的史料與書籍，輔以清真寺的文物圖片，敘述歷代北京的伊斯蘭教發展與清真寺內的宗教文化，以及對於牛街禮拜寺的沿革、建制、珍貴文物等有十分詳盡的敘述，提供了筆者在撰寫論文上，對於北京地區的伊斯蘭文化有些許的理解。

《城市中的少數民族》一書中，由「中國國家民委政法司散雜居處」與「中國都市人類學會」組成的「北京市牛街地區現狀調查組」，於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日到十一月三十日，先後對於北京市宣武區民宗辦、宣武區教育局、宣武區政府檔案館、牛街清真牛羊肉市場、北京回族學校、回民小學等二十多個組織與當地具有代表性的回族人士進行調查，本書分為三個議題來介紹牛街回族社區，一為對社區整體的介紹：〈北京市牛街地區現狀調研報告〉一文對於牛街街道的歷史

¹⁶此書的編纂過程十分艱辛，由於《岡志》的原本早已毀於文化大革命時期，有鑒於要保存珍貴史料的使命，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於一九八八年得到北京史專家張次溪之子捐出的《岡志》手抄本，雖然手抄本內容不盡完整，但卻是保存明清時期牛街地區史料的重要文獻，故刊印了以張家所藏的《岡志》手抄本一書，即為《北京牛街志書—《岡志》》。參見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北京牛街志書—《岡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序)頁 1~2。

¹⁷同上註，(序)頁 2。

沿革、人口數據、行政區劃加以敘述，並對於牛街街道辦事處的民族工作方針加以介紹；第二篇〈牛街危改〉則對北京宣武區政府推行的都市更新計劃（危改計劃）之原因、實施情形、居民的意見反映、政府單位的處理態度等加以介紹，讓筆者可藉此初步了解危改計劃的情形，以作為本文的論述基礎。第三篇〈從牛街清真牛羊肉市場的成長看市場經濟條件下北京市的清真食品供應〉，對於清真牛羊肉市場當初擁擠的市場環境與肉品供應量不足等諸多缺點，配合政策的執行，加以改善，更帶動了周邊郊區的牛羊肉行業的繁榮，由於配合得當，使得傳統的回族商業型態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促使牛街品牌的興起。這三篇文章以不同的角度切入，從三個面向來探討北京牛街的議題，雖然是官方組成的調查小組，文中仍有官方的意識，但由於其組織動員的調查力龐大，足以收集全面且多樣的研究資料，讓筆者在牛街民族志的資料收集上，獲益良多，也能從中理解當時牛街回族社區的樣貌。

中國學者良警宇所著的〈牛街：一個城市回民社區的形成與演變〉，為其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的博士論文，文中提到牛街社區的歷史變遷與一九九七年即將開始的牛街危改計畫，是本詳細的民族志資料。本書有著全面且完善的田野資料，採用巨觀式的調查角度來描述北京牛街回族生活的樣貌，分別以清真寺、生計、婚姻與家庭、文化接觸、拆遷與前景等六個主題，對牛街社區的形成與演變進行描述，各方面的主題，都有著詳細的田野調查，在筆者於二〇〇四年七月與她訪談中得知，當初她參加了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計畫，根據田野調查的資料來撰寫此文，這是十分難得的機運。良警宇在文末提出，由於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都市化與現代化的影響，削弱了原有社區的凝聚力，但同時又讓社區轉型為一個更大範圍的回族經濟與文化中心。¹⁸若從博士論文的的角度來看，在許多訪談資料的描述呈現後，似乎少了一些精闢的闡述，這或許是受限於中共政權內部的壓力而無法暢所欲言，是十分惋惜的地方。

美國學者杜磊（Dru C. Gladney）有專著《中國穆斯林－人民共和國的民族主義》（*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一書，於一九九一年出版，杜磊曾於一九八二到一九九〇年間前往中國四個回族社區作田野調查，對於中國穆斯林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民族認同與回族認同等議題加以討論與分析，他提出中國回族的民族身分確立是中共政權實施民族認定調查後，以法令規定的結果，是透過國家力量製造出的想像中的民族邊界。他選取了中國四個不同典型的回族社區來呈現其論點，包括中國西北納家戶的宗教復興、長營回族自治鄉的族內婚制以及中國東南地區陳埭回族的民族識別與國家力量介入之研究，其中北京牛街回族社區的個案，則是以都市回族的認同問題為主題來進行研究分析。他提出都市回族最明顯的民族邊界在於回族食用清真飲食，以此和其他

¹⁸良警宇，〈牛街：一個城市回民社區的形成與演變〉，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論文，1999年，頁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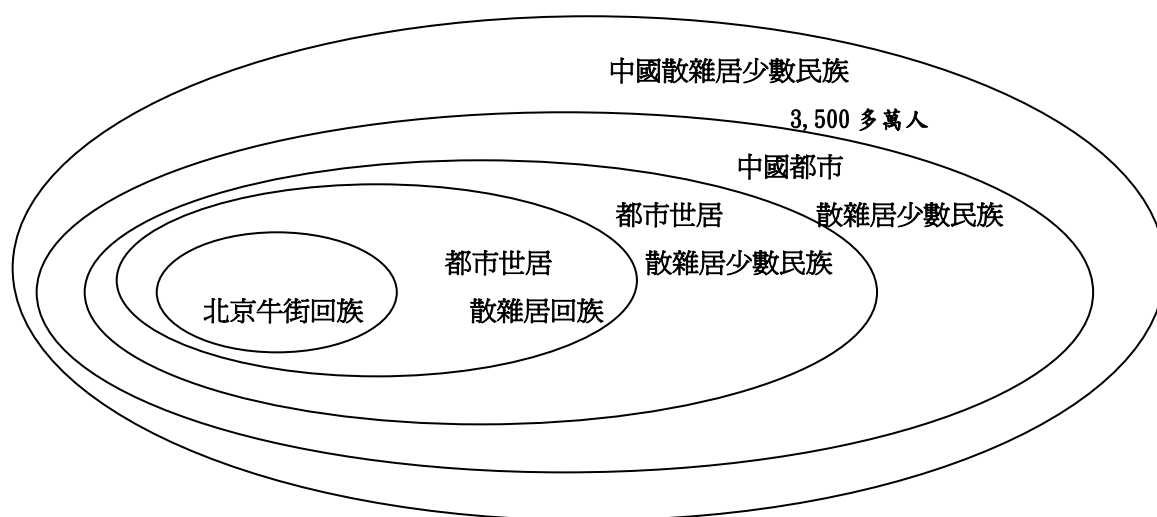
民族做區別。¹⁹都市回族在外觀上已經很難與漢族作區分，因為都市回族已經被中共政權推行的民族政策影響下，從宗教中被分離出來，已經與回族聚居區內的穆斯林不同，呈現出新的民族樣貌，以及都市回族社區面臨解體再重組的過程，這都展現出中共政權想達到一個全新與多文化並存的中國民族型態，也就是中國學者費孝通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之例證，從中不難看出中共政權的民族政策之走向，以及日後都市回族的發展情形。

¹⁹Dru C. Gladney,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83~188.

第三節 研究當代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的特色與意義

一、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的定義

在中國大陸學界多以「散雜居少數民族」這個名詞作為稱呼那些大分散小集中的少數民族，其定義有兩個意思：「一是居住在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數民族；一是居住在自治地方以內但不實行自治的少數民族。」²⁰例如本文的北京牛街回族，因不居住在回族的自治地方範圍中，故屬於散雜居少數民族。在本節中，筆者會透過同心圓的理論架構來鋪陳，希冀透過本節的說明為本文的論述提供一清楚的理論架構。底下筆者所繪製的同心圓來逐次分析「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都市世居散雜居少數民族」等議題。



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有 3,500 多萬人，占全國少數民族總人口的 1/3，其中，居住在城市中的散雜居少數民族有 1,600 萬人，居住在民族鄉的有 900 多萬人，分散居住在農村的約 1,000 萬人。²¹由此數據可以知道散雜居少數民族在人口上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依據楊侯第主編的《散雜居民族工作概論》一書，介紹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分布有著「廣」、「多」、「雜」、「散」四個特點，²²更可看出中國少數民族的散雜居分布型態。

²⁰楊侯第主編，《散雜居民族工作概論》，頁 50。

²¹中國國族事務委員會信息中心，查詢日期：2005/5/23，

http://www.seac.gov.cn/cm/cm_bulletincontent.do?id=cm00846195a88f6d&xslt=template_center2&action=20。

²²同註 20，頁 71~72。

二、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的類型

(一) 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

大致依照是否擁有當地本城市的戶口分為「都市世居散雜居少數民族」（例如北京牛街的回族居民）和「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兩種。²³這一點在筆者前往北京牛街回族社區做田野調查工作時，與當地的居民訪談時有著明顯的體認，若人民沒有北京市當地的戶口，將無法有工作、居所及其他市民的權利，將會變成流動人口，這樣的狀況也對城市民族工作的推展有著很大的影響性。

筆者參考了中國大陸學者沈林在〈中國城市裡的少數民族〉與楊侯第先生主編的《中國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論與實踐》的內容，分別對「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之聚落形成原因的不同狀況，做出分析，經歸納整理後如下四項：

1. 歷史因素：「都市世居散雜居少數民族」

指中國歷代以來因為經濟、政治、文化活動形成的城市少數民族，大多因為少數民族生活習俗、宗教信仰或統治者的需要，聚集於清真寺、喇嘛廟或兵營周圍，幾乎都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中共建政後將這些聚居區納入了新的行政管理系統，許多城市還特別設立了民族區、民族街道、民族鄉、民族居民委員會。例如，北京就有數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回族聚落，像北京牛街回族社區就有約 3,000 戶回族定居，²⁴這樣的聚居區是中國都市少數民族聚居區中最典型與最基本的部分，聚落數目不會大幅增加，但其人口則會日益增加，為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的主要部分。

都市的世居民族適應了都市的社會文化環境，學會了都市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道德觀，但也保留了自身民族的特點、傳統文化與生活習俗，這種現象出現在回族、蒙古族、滿族等因歷史發展而定居的民族，其他的少數民族亦有世居的狀況。²⁵都市世居少數民族的劃分在民族過程與都市過程的相互聯繫的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2. 政治因素：「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幹部聚落」

(1) 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本地幹部聚落：因民族工作機關的設立而形成

中共建政後，開始推行民族工作，並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了許多民族工作部門（民族事務委員會），也相應建立了民族文化、民族研究與民族教育等機關。這些機關一般都設立在各城市中，而政府也培養了許多熟悉本民族文化，也具有相當漢文化的少數民族幹部進入該機關服務，這些機關人數多在數百人到上千人左右，由於中國特殊的行政體制，同一單位的民族幹部，其居住地點也都集中在一個或幾個社區的樓房內生活，連同其家屬也一同居住，也因此形成了大小不一

²³楊侯第主編，《散雜居民族工作概論》，頁 74。

²⁴楊侯第主編，《中國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年，頁 55。

²⁵沈林，〈中國城市裡的少數民族〉，收入楊侯第主編，《中國城市文化與城市生態》，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8 年，頁 22。

的少數民族聚落。²⁶

其聚落特點是，民族成分多，來自各民族地區，而成員的文化素質高，多為本民族的傑出與代表人物，職業處於管理與研究者的地位，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與影響力。這是中國特有的民族聚居型態，一般來說，研究者並不會特別注意這類的少數民族聚落並針對他們進行民族研究工作。

(2) 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外地幹部聚落：因設立駐外辦事機構而形成

為加強與東部經濟文化的溝通，位於中國西部的少數民族地區一般都會在東部的大城市設立辦事機構，其職責範圍廣，既要溝通東西部政府之間和民間的聯繫，也要替進入城市的少數民族提供服務，並協助當地市政府處理有關民族關係的事件，這些工作人員多為少數民族，而該辦事機構周圍長年有著許多城市少數民族的流動人口，慢慢地形成了一個個各具有民族與地方特色的少數民族聚落。例如北京的新疆與西藏辦事處，其濃厚的民族特色以早被北京市民所熟悉。²⁷

上述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帶有官方或半官方的色彩，但前者的政治性功能和結構強一些，後者的經濟性功能較強。

3. 教育因素：「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學生聚落」

民族學院是中國政府專門培養少數民族高級人才的綜合性大學，目前中國有 13 所，²⁸在校學生人數多在 2,000 到 7,000 人之間，這些學校是都市中少數民族成分最多、人口最密集、文化最發達的地方。單就學生而言，一般在都市生活的時間為 3 到 10 年不等，但就學校整體而言，則是都市的一部分，各民族學生在此活動、學習，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少數民族學生聚落。除了民族學院外，亦有民族班的型態，例如：在北京有中央民族大學、西藏中學，還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十幾個大學中設有民族班。²⁹這類型的學生成員，具有年紀輕、思想活躍、有較高的民族意識且對社會和民族責任感較強等特點，是中國城市多元文化建設和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人群。

4. 經濟因素：「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打工族聚落」

(1) 組織形成的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打工族聚落：因特色旅遊景點而形成

²⁶參考沈林，〈中國城市裡的少數民族〉，頁 22；楊侯第編，《中國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論與實踐》，頁 57~58。

²⁷參考沈林，〈中國城市裡的少數民族〉，頁 22；楊侯第編，《中國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論與實踐》，頁 56。

²⁸為中央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中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學院、雲南民族學院、貴州民族學院、廣西民族學院、廣東民族學院、青海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西北第二民族學院、東北民族學院、中央民族管理幹部學院，分別分布在北京、武漢、大連、成都、廣州、蘭州等中國大都市。

²⁹參考沈林，〈中國城市裡的少數民族〉，頁 23；楊侯第編，《中國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論與實踐》，頁 58。

由於改革開放的原因，許多大城市相繼在城區裡興建「民俗村」、「民族園」等觀光景點，並聘請了來自各地的少數民族青年男女，在園區內進行歌舞、宗教與風俗的表演，也大量地將各民族原汁原味的傳統服飾與民居搬進園區，以作為吸引觀光的賣點。而這些來自各地的少數民族，大多來自偏遠山區，對於城市的生活較為陌生，但在工作的過程中，逐漸成為城市少數民族聚落的一份子。³⁰

（2）自發形成的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打工族聚落：因進城經商而形成

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許多鄉村的農民進入城市，自一九八〇年代初，許多邊疆的少數民族開始進入中國東部都市從事商業活動，由於共同的生活習慣與宗教信仰，開始組成了一些零散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等都有，如北京的海淀區就有幾處「新疆村」（維吾爾族聚居區）。³¹

其成員大多是農民，文化較低，但卻是城市中最有活力與生命力者，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都市化程度的加快，這類的聚落也將日益增多。這種類型的形成過程則是自發且曲折的，因此與都市發展過程有著許多的矛盾，引起許多政府部門與研究單位的注意，並開始進行研究的調查。

上述兩者共同之處在於都是來城市就業的流動少數民族人口，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是否有組織的形成，所以兩者在技術、經濟能力、社會知識、價值觀等方面有差距的。

（二）民族鄉的散雜居少數民族

民族鄉是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³²的一種補充形式，相當於鄉的少數民族聚居地方的一級地方國家政權，建立民族鄉的目的在於適應中國少數民族散雜居的分布特點，保障和實現其自治權力。

根據一九五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一九九五年《（中國）國務院關於建立民族鄉若干問題的指示規定》，建立民族鄉的首要條件是建鄉民族的人口必須佔 30% 以上，一般來說民族鄉的類型有：1. 以一個少數民族聚居的相當於鄉的地方建立的民族鄉 2. 以兩個或兩個以上少數民族共同聚居的相當於鄉的地方建立的民族鄉，³³所以民族鄉中的少數民族人口絕大多數是散雜居少數民族。民族鄉的名稱，一般以地方名稱加民族名稱組成，例如：內蒙古額爾古納市室韋俄羅斯族民族鄉。中國現有民族鄉大約 1,200 多個。³⁴

³⁰參考沈林，〈中國城市裡的少數民族〉，頁 24；楊侯第編，《中國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論與實踐》，頁 57。

³¹參考沈林，〈中國城市裡的少數民族〉，頁 24；楊侯第編，《中國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論與實踐》，頁 57~58。

³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民族自治地方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中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是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是國家的一級地方權力機關和一級地方國家行政機關，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中國民族區域自治一辭條，頁 539。

³³同上註，民族鄉一辭條，頁 320。

³⁴楊侯第主編，《散雜居民族工作概論》，頁 75。

(三) 農村星散的散雜居少數民族

在中國農村裡，除了相對集中的民族鄉外，還有許許多多分散在農村各地的散雜居少數民族，他們主要分散在漢族與其他民族聚居的地區，在人數上是絕對的少數，因此他們是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中最為弱勢的一群，人口約有 1,000 萬人，³⁵由於分布範圍廣大，所以也是一個容易和其他民族發生衝突的群體，在社會中缺少人數眾多的優勢，因此在民族心理上有著較強的民族意識與敏感性。

(四) 11 個未實行自治的民族之散雜居少數民族

在中國學者的分類中，這 11 個沒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民族有高山族、京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塔塔爾族、烏茲別克族、赫哲族、俄羅斯族、門巴族、珞巴族，因這 11 族全族皆屬於雜散居少數民族，由於全部人口總計只有十幾萬人，通常因為所佔比例較少，常忽略不計。³⁶

三、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研究特點

在中國散雜居少數民族中，最具有特殊性與影響性的便是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因此下文便聚焦在這個主題來作討論。

都市化是社會經濟發展下的一種必然的過程，而民族散雜居化則是民族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狀態，是由各民族從封閉到逐步交流，相互密切聯繫的過程，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逐漸影響了都市化發展的方向，兩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具有強烈性，民族問題的敏感性，民族關係的複雜性，這些困難與問題的存在，將會成為都市化進程中潛在的定時炸彈，嚴重影響了都市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穩定，成為阻礙都市化順利進行的一大障礙。筆者認為「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在中國的民族關係與民族問題中有以下四個特點：

1. 指標性

都市是國家或地區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由於都市具有中心功能，因而它便成為外國或海外觀察中國民族問題的窗口。國外人士往往通過都市的少數民族人口的狀況與生活型態，來評斷中國民族工作與全體少數民族的狀況。此外，中國一些少數民族問題和國外的少數民族有著種族、宗教乃至親友聯繫，像中國的穆斯林便與國外的穆斯林便有著極為深刻的宗教情感與民族聯繫，日前丹麥出現侮辱穆罕默德的漫畫，中國境內的穆斯林也同樣群起激昂，參與抗爭的行列。

³⁵同上註，頁 75。

³⁶同上註，頁 76。

2. 敏感性

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問題具有敏感性，隨著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各民族人民對自己民族的地位與權力是否平等，對於民族矛盾與民族關係的關心程度與敏感程度日益提高與加強，而都市中的少數民族對於自己在社會生活的各領域之處境與待遇則更為敏感，對於少數民族被歧視或遭受輕視等現象，即便事情是很輕微的狀況，也容易引起極大的反應。

3. 代表性

都市少數民族之中有很多都是本民族的代表人物和知識份子，所以他們關注的不僅僅是當地的民族問題，更多的是各地乃至於全國範圍內本民族的發展問題。因而都市民族問題的產生和解決，不僅直接影響都市中的民族關係，也會影響民族地區乃至於全國的關係。

4. 輻射性

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問題具有輻射性，除了世居少數民族外，大多是由外地或鄉村遷徙而來，因此對於發生在本民族聚居區的一些重大事情，則很容易傳遞到各地的都市少數民族中，反之，若發生在都市中的民族問題，則也很容易傳遞到其民族的聚居區，甚至在全國發生影響，引起連鎖反應。由於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與民族地區之間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發生在一個都市中的影響民族關係的問題，往往很容易擴散到其他城市，甚至在民族地區引起影響。

在前幾年中國各地所發生的民族問題來看，有很多事情是由於非穆斯林民族對於伊斯蘭教的教義不了解與不尊重穆斯林的宗教習俗所引發的，例如由一九八九年三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和太原希望出版社協作出版的《性風俗》一書，對於伊斯蘭教清真寺進行歪曲與誹謗的言語；³⁷一九九三年一月，四川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一套《腦筋急轉彎》之書籍中，出現醜化侮辱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插圖和文字；³⁸二〇〇〇年山東省縣發生的「陽信事件」³⁹等等，前面兩者是由出版社所引起，後者則是在日常生活中的面臨到的民族衝突，而現今兩者之中，又以

³⁷該書出版後即引起全中國穆斯林的抗議，後來被收繳、銷毀，編著者和出版社依法受到處理。參見楊侯第主編，《中國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論與實踐》，頁 180。

³⁸此事件引起了成都市和甘肅、陝西、雲南、湖南、青海、北京等省、市、自治區穆斯林群眾的不滿和抗議。蘭州市和臨夏市的穆斯林群眾還上街遊行聲討，造成停課、停工、停商、停耕。此案後來由成都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並附帶有「甘肅省伊斯蘭教協會」、「甘肅省蘭州市伊斯蘭教協會」和「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伊斯蘭教協會」提起的民事訴訟，經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以玩忽職守罪分別判處四川美術出版社一副社長和總編輯部主任有期徒刑。同上註，頁 180。

³⁹「山東省陽信縣河流鎮一家豬肉店打出『清真豬肉』的橫幅，引起不吃豬肉的回民反感，2000年12月8日回民向縣府交涉卻被指為鬧事而遭拘捕，12月12日引發中國河北省勐村回族自治縣數百名回民到陽信縣聲援，與勸阻民警發生衝突，事件中有六名民眾死亡、十九人受傷，民警亦有十三人受傷，發生警民流血衝突。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國務院指示全力搶救傷者，盡快查明真相，依法嚴肅處理。死者已按回族習俗安葬，傷者全部得到有效治療。」明報新聞網，查詢日期：2006/3/31，<http://www.islam.org.hk/current%20event/Shandong2.asp>。

後者的狀況最為常見，造成了民族關係的緊張與社會和諧的不穩定因素。

回族等中國十個穆斯林由於受伊斯蘭教教義的薰陶，自古以來就有一種互相幫助的民族傳統美德，有天下回族一家親的觀念，若有某地的回族受欺負，其他地區的回族或穆斯林便會前來支援或幫助，這種民族意識與動員的力量十分強大，因此也在考驗了當地政府的民族政策擬定與民族工作實際落實的功力是否落實，這也是研究都市少數散雜居民族很重要的意義之所在。

第四節 當代中國都市回族社區議題的研究特點

一、相關名詞定義與解釋

1. 都市、城市 (City)

本文的「都市」與「城市」這兩個詞彙，並沒有差異，皆為英文 City 一詞的意涵，在此特為說明。

都市是國家或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具有交通便利、工商業發達、社會生產力水準高、商品經濟活躍等特性，各種訊息資料匯集迅速，尤其在教育、科技研究等機構多，管理人才聚集的優勢。因此，都市自然成為中國各民族聚集的地方，多民族的雜居化成為中國都市的主要特徵之一。

據一九九二年的統計資料顯示，中國現有城市 517 座，城市人口比例為 32.33%，⁴⁰各城市都有多民族共存的現象，北京市有 56 個民族，上海 44 個，南京和西安各 42 個。⁴¹

本文涉及的城市主要是有歷史延續性並存在有古老的回族社區的城市。這些城市中包括中國的古都西安、南京和北京，亦包括古老的商業城市和地區中心城市廣州、泉州、天津、呼和浩特、蘭州、西寧、昆明等。

2 社區 (Community)

美國學者B.E莫舍的定義是：「人類社區是功能上相關聯的一群人，他們對於某一時期住在某一地區，分享一共同的文化，被安排在一社會結構之內，感覺到自身具備一群體所應有的獨特或獨存性。」⁴²中國學者馬壽榮提出的定義是：「一定地域內有特定生活方式並具有成員歸屬感的人所組成的相對獨立的人們共同體，它具有地域性、公共紐帶關係、歸屬感和社區成員所公認的規範與秩序等特徵。」⁴³關於社區的定義有很多，但在眾多的定義中，以英文Community來看，它有著公社、社會、團體、公眾以及共同體等涵義，也有學者將它引申為精神上或心理上的共同體，稱為精神社區或心理社區。⁴⁴

西方的「社區」用語，對於中國回族而言，其實是很陌生的，中國學者楊文炯主張以哲瑪爾提 (Jamat) 一詞來取代社區的說法。他認為回族人對自己的以清真寺為中心的聚居區的稱謂是有自己的語言，也就是 Jamat，這在阿拉伯文中的意義就是「聚集、集體、團結與共同體」，它是回族內心世界的精神共同體，

⁴⁰阮西湖，〈居民城市化的意義和理論〉，收入李德洙主編，《都市化與民族現代化-中國都市人類學會第一次全國學術討論會》，天津：中國物資出版社，1994年，頁8。

⁴¹鄭洪芳、王宏曉，〈論現代城市中和諧的民族關係的構建〉，收入李德洙主編，《都市化與民族現代化-中國都市人類學會第一次全國學術討論會》，天津：中國物資出版社，1994年，頁351-352。

⁴²楊文炯，〈Jamaat地緣變遷及其文化影響〉，《回族研究》，2001年第2期，頁17。

⁴³馬壽榮，〈都市回族社區的文化變遷—以昆明市順城街回族社區為例〉，《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頁33。

⁴⁴良警宇，〈牛街：一個城市回民社區的形成與演變〉，頁14。

在中國也稱之為「寺坊」，將「大分散、小集中」散居在各地的回族連結在一起。

二、當代中國都市回族社區的研究重點

在二〇〇〇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時，中國回族的總人口為 9,816,805 人，占中國總人口的 0.79%；中國都市回族人口有 3,090,015 人，占中國回族總人口的 31.47%，⁴⁵從上面的數據更可以看出，回族的大分散、小集中於中國各地的居住特色。

在研究當代中國都市回族中，有兩個問題許多學者所關注的，一是傳統都市回族社會的社會結構為何？二是隨著中國社會自近代以來劇烈的社會變遷，都市回族社會結構發生了怎樣的變遷？這將成為本文關注的兩個基本問題。

（一）傳統都市回族社會的特點

本文所指的「都市回族社區」是指回族在歷代中國傳統都市中，以伊斯蘭文化文化影響下的聚居習慣所形成的各個聚居區或社區，它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以清真寺為中心，以一個村莊、一條街道、數戶或數十戶回族人家組成的聯合型態。其性質屬於上文第三節中談到的都市散雜居少數民族之範疇，由此可以想見他們一般是散居的型態，而且人口較少，但又因為經濟、文化、宗教、宗教等生活需求，集中住在中國各都市中，成為中國少數民族中都市化程度最高的民族，所以都市回族及其聚居特點，也是當前中國都市少數民族聚落中分布最廣、人口最多，也最具有研究特色的民族。⁴⁶

筆者將都市回族社區的特點分為四項：

1. 雜居性

即便是回族相對集中的牛街回族社區，在中國一九九〇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回族也僅佔當地人口的 23.1%，足可見其雜居性，這樣的特點在中國都市回族社區中，也是極為常見的。

2. 異質性

都市作為經濟、文化、政治的中心，免不了會影響居住在當地居民的文化素質、就業選擇、教育程度的高低，形成了所謂的社會階層，也連帶地讓都市回族社區裡的回族居民出現了對事物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念與民族認同意識，這在筆者於二〇〇五年七月前往北京牛街調查時，訪談回族居民的心聲時，有著深刻的感觸，例如，牛街居民可大略粗分為兩類，一是較重視生活層面的溫飽，努力在就

⁴⁵中國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經濟發展司編，《2000 年人口普查中國民族人口資料》，頁 5、29。

⁴⁶參考張中復，〈都市回族問題研究定位的再思考〉，收入中國回族學會編，《回族學論壇第二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回族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303。

業與子女教育上謀求更好的生活水準，僅遵守基本的伊斯蘭教義，在衣食無虞之際，也不太會積極前往麥加朝覲，生活作息與漢族居民無異；另一個類型是達到了生活的基本水準後，也會定時進清真寺作禮拜，確實實踐伊斯蘭教規與《古蘭經》的生活規範，積極開辦各種宗教自學班，鼓勵年輕人參加學習宗教知識，他們十分擔心牛街的回族出現民族意識消失與宗教信仰淡薄的情形，而積極地努力著。前者多為五十多歲以下的牛街回族，而後者則以六、七十歲的長者居多，這不僅是年紀的劃分，更可看出都市回族在面臨現代化與都市化所引發快速的生活節奏影響下，使得他們較注重物質層面的追求，而有著深厚伊斯蘭文化底蘊的耆老們，則保有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繼續做到了身為穆斯林的基本功課，這些都可以看出都市回族對於自身族群文化與民族邊界維持的重視性程度多寡。

3.流動性與開放性

由於都市是個高度經濟與文化發達的地方，許多的資訊與物流往來頻繁，居住在此地的回族居民會隨著工作或就學等因素，社會身分也不斷地發生變動，此外還有外地遷入都市的外來人口，長期或短期停留在社區內，這也讓社區具有了流動與開放的特性。

4.變動性

都市回族社區是因為歷史上各種經濟、文化、政治、宗教等因素，相對聚居在某些街道裡而形成的，如果將漢文化視為中國的主流文化，那麼回族社區文化則可以看作是亞文化或邊緣文化，回族社區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受到都市主流文化的直接衝擊與影響，社會結構的各個層面發生著持續的變遷，⁴⁷因此都市回族社區的內涵是會隨著區內居民以及時空因素而不斷變化與形塑的，不是停止的狀態，具有流動與開放的性質。

(二) 引發都市回族社區變遷的因素及其影響

影響牛街社區變遷歷程的重要因素就是國家政策與國家力量的干預，自一九五〇年代以後，國家力量改變了社區傳統的權力結構，讓社區居民的一切日常生活作息，包括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種物質和精神的層面，都涵括在國家現代化的過程當中，筆者參考了良警宇的說法與自己的意見，歸納出國家力量的干預有以下四點：

1. 確立民族平等政策的前提，透過民族政策與宗教政策的實施，使得清真寺的權威與社會規範作用逐漸消失

中共建政以後，國家大力培養民族幹部以作為民族工作的任務，創辦了許多民族學校，鼓勵和幫助少數民族學生入學，並給予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以推行國家政策，例如：一九五〇年代在北京牛街設立的回民學院。這種國家普通

⁴⁷馬壽榮，〈都市回族社區的文化變遷—以昆明市順城街回族社區為例〉，頁 33。

教育的全面實施，不僅取代了清真寺的經堂教育，也使得都市回族逐步融合到中國都市的主流社會價值觀之中，更讓回族社區內部的凝聚力消散。

2. 透過廣泛而有計畫地安排轉業和就業，將社區中的成員納入單位，使得個人成爲依附於國家和單位，而不再依附於社區之中

一般來說，人民對於單位組織的依賴可分爲四方面：一是政治上的依賴，主要指加入黨團機構，可幫助升遷、提拔、工作調動等方面；二是福利上的依賴，指子女入學、提供住房等；三是社會保障的依賴，包括退休養老、醫療費報銷、工作傷害補償等；四是業務發展上的依賴，例如技術培養、外出學習機會等，⁴⁸由此，在城市中的居民必須以服從工作單位或是學校單位等單位組織，才能享有上述四者的權利與保障。

中共政權的統治通過控制都市居民所隸屬的單位組織，進而實現對個人的管制，例如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讓個人與住房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個人的遷移受到限制。這樣的機制是中國都市社會中所特有的現象，即個人依賴單位，而單位又依賴於國家體制，⁴⁹對於都市回族而言，就謀生、找工作、購房等日常生活而言，回族傳統的寺坊制度已經無法抵抗國家體制的層層管控，這也是都市回族逐漸脫離寺坊制度的因素之一。

3. 透過廣泛建立的基層地方組織，進一步的實現對社區的控制。

在中共建政後，城市地方政權實行了「二級政府、三級管理、一級自治」的管理體制，也就是建立「市」跟「區」二級政府，實行「市」、「區」、「街道辦事處」三級管理，以及街道辦事處之下的「城市居民委員會」。⁵⁰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通過的《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與《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這兩個條例，成立「街道辦事處」與「城市居民委員會」這兩個中國城市社區的基本組織，⁵¹「街道辦事處」是城市中最小一級的行政區域，它是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政府的派出機構。

「城市居民委員會」是中國城市基層群眾性的自治組織，其任務就是辦理有關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項，反映居民的意見與要求，調解居民間的糾紛等等，居委會按照居民的居住情況，一般以 100 戶到 600 戶爲範圍，居委會下設居民小組，由居民小組推選出居委會代表，從中再選出主任、副主任，每屆任期一年，其費用與委員的生活津貼由省或直轄市政府統一撥發。目前中國有城市居民委員會 11.5 萬個，居委會幹部 50.2 萬人，他們聯繫與管理著中國近 4 億的城市人口，以及城市中的 7,000 多萬的流動人口。⁵²

⁴⁸張俊芳，《中國城市社區的組織與管理》，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52。

⁴⁹良警宇，〈牛街：一個城市回民社區的形成與演變〉，頁 17。

⁵⁰同上註，頁 17。

⁵¹雷潔瓊主編，《轉型中的城市基層社區組織－北京市基層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3。

⁵²張俊芳，《中國城市社區的組織與管理》，頁 56~57。

然而位在中國的都市回族社區也不例外，「城市居民委員會」同樣也管轄著都市回族社區的一切，在牛街街道辦事處內就有 32 個居委會，⁵³配合著單位體制，這些基層組織成爲了國家政府體制管控社區的方式。

4.都市改建與拆遷對都市回族的聚居型態影響深遠

都市回族社區因爲城市改建、擴建或重新規劃，由於回族社區一般都位於城中的精華地段，因此回族傳統聚居的寺坊都被改造或拆遷，在地域上已經不是一個完整的回族社區，這些改變對於傳統社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等都產生巨大的影響性，這在中國各地的都市回族社區都能見到這樣的例子，像天津市的萬新村、蘭州市的金城關回族小區、雲南昆明市的順城街回族社區等等，都面臨到了這樣的社區危機與居民重組的過程。

都市回族社區將從「圍寺而居」的聚居型態，走向「近寺而居」或「遠寺而居」的散居型回族社區，更爲深刻的是，社區的自然邊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開始消失，社區逐漸從封閉走向開放，面臨著都市中各種多元異質文化的挑戰，從內部來看，社區內部也因爲民族人口的變化影響到社區的發展，而社區的民族人口的構成更直接影響到了社區的興衰，例如：人們住家離清真寺或脫離了傳統的寺坊制度範圍，到清真寺禮拜的次數與人數也會連帶減少，而且原先能透過共同的宗教生活方式，促進社區內的回族交流與互動的機會也大爲減少，導致社區內部的文化和制度對社區居民的控制力與整合力弱化，那傳統的回族社區將會轉變成祇空有回族社區的軀殼，而無伊斯蘭文化的寺坊機制，僅爲一種與漢族無異的社區而已。

社會在發展，中國目前正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努力讓國家現代化，這樣的社會變遷，連帶的使得具有傳統伊斯蘭文化的回族社區，在中國歷代以來逐漸形成的回族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寺坊制度，開始面臨瓦解與重組的過程，使得回族社區逐漸消失成爲都市社會中的一份子。

都市回族在面臨傳統與現代化的抉擇上，比起中國分布在各鄉鎮的少數民族，有著更爲深刻的體認，這也是研究當今中國都市回族社區的觀察點之一。

⁵³良警宇，〈牛街：一個城市回民社區的形成與演變〉，頁 17。